



二十世纪儒学研究的回顾和反思 傅永聚 韩钟文

(2006-2-10 14:54:54)

作者：傅永聚 韩钟文

儒学犹如一条源远流长的大河，导源于洙泗，经过二千五百多年生生不息的奔腾，从曲阜邹城一带流向中原，形成波澜壮阔的江河，涉及整个中国，辐射东亚，流向全球，泽惠万方。儒学曾经是中华文化的主流、东亚文明的精神内核。但是进入20世纪后的儒学，遭遇到空前严峻的挑战，也面临着再生与复兴的历史机遇。一百多年来，儒学几经曲折，备受挫折，又有贞下起元、一阳来复之象，至20、21世纪之交成为参与“文明对话”的重要角色。

牟宗三先生说：“察业识莫若佛，观事变莫若道，而知性尽性，开价值之源，树价值之主体，莫若儒”（《生命的学问》）。儒、道、释及西方的哲学、耶教等都指示人的生命意义的方向，但就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而言，儒学是安身立命之道。孔子、儒学追求的“内圣外王之道”，一直是中国人的人格修养与经世事业的价值理想。“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从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至康有为、梁启超、梁漱溟、熊十力、牟宗三，中国的儒学代表人物就是怀抱志仁弘道的精神去实践自己的生命价值，开拓教化天下的事业与创建文化中国的理想的。中国文化历经艰难，几经跌宕，却如黄河、长江一样流淌不息，且代有高潮，蔚成奇观，与孔子及其所创建的儒家学派的所做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儒学一直对中华文化各个层面产生着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儒学统摄哲学、伦理、政治、教育、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品格及关怀现世人生的精神，使它成为一套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的思想体系，从一个人的生存方式，到家、国、天下的构成，都在儒学关怀与实践的范围之内。经过二千多年的传播、积淀，儒学一直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心理结构的形成。然而，进入20世纪，又出现类似唐宋之际“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的危机，陷入困境之中。唐君毅以“花果飘零”、余英时以“游魂”形容儒学危机之严峻，张灏则称这是现代中国之“意义危机”、“思想危机”。

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中国社会、文化进入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的时代。1950年废除科举制度，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西方各种思潮、主义潮水般地涌入，风起云涌的政治革命、文化革命、社会转型、文化转型，导致了传统士阶层的解体与分化，新型知识分子的诞生与在文化思想领域倡导“新思潮”、“新学说”，激进的反传统思潮的勃兴，现代化进程的启动和在动荡不安中急遽推进，使20世纪中国处于“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的境遇之中，儒学的危机也由此而生。

一个世纪以来，儒学的命运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相消长，也与学术界、思想界及政治界对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儒学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儒学与全球的“文明对话”的关系，所形成的认识有关。从19世纪末至21世纪初，一百多年来，中国的学术界、思想界与政治界围绕着孔子、儒家及儒学的命运、前景问题展开了广泛的持久的争鸣，而这类争鸣又直接或间接地同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全球化与中国化、文明冲突与文明对话、西方智慧与东方智慧等等论题交织在一起，使有关儒学的思想争鸣远远超出中国儒学史的范围，而成为20世纪中国思想史、学术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百年儒学的历史大致沿着两个方向演进：一、儒学精神的新开展，使儒学于危机中、困境中得以延续、再生或创造性转化；二、儒家学术思想的研究，包括批判性研究、诠释性研究、创造性研究在内。由于20世纪中国是以“革命”为主潮的世纪，学术研究与政治革命的关系特别密切，故批判性研究常常烙上激进的政治革命的烙印，超出学术研究的范围，并形成批判儒学、否定儒学的思潮，酿成批判论者、诠释论者与复兴论者的百年大论争，一直延续到21世纪。

回顾百年儒学精神新开展与儒学研究的历程，有一奇特现象值得重视。活跃于20世纪中国思想界、学术界、政治界、教育界的精英或代表人物，都不同程度地介入或参与了有关孔子、儒学思想的争鸣。如：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戴季陶等，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严复、胡适、殷海光、张毓生等，无政府主义吴稚晖、朱谦之等，现代新儒家梁漱溟、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学衡派的代表人物梅光迪、吴宓、陈寅恪、汤用彤

等，东方文化派的杜亚泉、钱智修等，新士林学派罗光等，以及张申府、张岱年等都参与了有关儒学的争鸣，并在争鸣中形成思想的分野，蔚成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最壮观的一幕。

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复杂性、丰富性远远超出了唐宋之际和明清之际，其思想争鸣具有现代性或现代精神的特色。美国学者列文森在《儒教在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以“博物馆化”象征儒学生命的终结，有些中国学者也说儒学已到“寿终正寝的时节”，但从百年儒学的精神开展与儒学研究的种种迹象看，儒学的生命仍然如古老的大树一样延续着，儒学曾经创造性的回应的印度佛教文化的挑战，儒学正在忧患之中奋然挺立，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这是儒学传统现代创造性转换的契机。人们在展望“儒学第三期”或“儒学第四期”的来临。百年儒学的经历虽曲折艰难，时兴时衰，但仍是薪火相传，慧命接续，间有高潮，巨星璀璨，跨出本土，落根东亚，走向世界，成为一种国际性的思潮，在全球性的“文明对话”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为人类重建文明秩序提供了可资汲取的智慧。儒学并没有“博物馆化”，儒学的新生命正在开始。因此，对百年儒学作系统的、全面的反思与总结，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的学术课题。

纵观百年儒学的历程，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在这五个阶段中儒学的命运、所遭遇的景况不尽相同，分述如下：

19世纪末至1911年辛亥革命为第一阶段 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导致儒家经世思想的重新崛起，晚清今文经学的复兴，特别是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的出版，托古改制，以复古为解放，既开导儒学的新方向，又开启“西潮”的闸门，如思想“飓风”，如“火山火喷”。章太炎标举古文经学的旗帜，与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今文经学派展开经学论争，而这场思想学术争鸣又与政治上的革命或改良、反清或保皇、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等论争交错在一起，显得格外严峻与深沉。诸子学的复兴，西学输入高潮的到来，政治革命的风暴席卷神州，社会解体与重建进程加速发展，传统士阶层的分化与新型知识分子的诞生，预示后经学时代的降临。思想界、学术界先觉之士以“诸子学”、“西学”为参照系，批判儒学或重新诠释儒学，传统儒学向现代儒学转型已初见端倪。

以辛亥革命至1928年南京政府成立为第二阶段 康有为、陈焕章等仿效董仲舒的“崇儒更化”运动创建孔教会，“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吴虞、胡适等提倡“打倒孔家店”，《新青年》派陈独秀、胡适与文化保守主义梁启超、梁漱溟、杜亚泉等，学衡派梅光迪、吴宓等展开思想文化争鸣，以张君勱、梁启超等为代表的人文主义与以丁文江、胡适、王星拱等为代表的科学主义的论辩，马克思主义李大钊、瞿秋白等也积极参与思想争鸣，各大思潮的冲突与互动，不论是批判儒学，或者是重释儒学及复兴儒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将儒学的研究纳入现代思想学术的领域之中，使思想争鸣具有现代性，从而导致儒学向现代思想学术转型。20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建制、研究方法深受“西学”的影响，有关孔子、儒学的论争已不同于经学时代，且与国际上各种思潮的论争息息相通。以现代西方哲学、科学、政治等学科的范畴、概念、方法去解读、分析、批判或重新诠释儒学，成为一时的学术风气，还出现“援西学入儒学”的现象。有些思想家、哲学家试图摄纳西学、诸子学及佛学中有价值的东西重建儒学，如梁启超的《儒学哲学及其政治思想》、《儒学哲学》等文化及《欧游心影录》，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冯友兰的《人生哲学》，已透露出出现代新儒学即将崛起的信息。

1928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第三阶段 30年代后，中国思想界、学术界出现“后五四建设性心态”，吸取西学的思想、方法，以反哺儒学传统，创造性地重建传统儒学，如张君勱、冯友兰、贺麟等；或者回归儒学传统，谋求儒学的重建，如熊十力、钱穆、马一浮等；即使是“五四”时期及传统的学者，在胡适提倡“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之后，也将儒学作为“国故”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的思想资料加以系统的研究。胡适的《说儒》就是一篇以科学方法研究孔子、儒学的示范之作。“后五四建设性心态”的形成，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建构起了积极的作用。一大批专家、学者参照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建制的原则与方法，分哲学、宗教学、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社会学、法学、史学、美学、文学艺术、教育学、心理学等等，对儒学进行系统的研究，还对不同学科的发展史作深入的探讨。如中国哲学史、中国教育思想史、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学术史、中国伦理学史、中国文化史、中国通史等；儒学研究也纳入分门别类的学科及学科发展史之中。钱穆在《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中说：“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入儒之学大相违异”。将数千年经学、儒学作为学术思想的资源或资料，分门别类地纳入学科专题研究之中，虽然使儒学“内圣外王之道”的“道”变为“学术”，由“专门之学”代替“通儒之学”，但恰恰是这种转变，促使儒学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这一阶段是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的年代，令人惊异的是，在动荡的岁月中出现了一个学术繁荣期，学术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并不亚于乾嘉时代，儒学研究也是如此。“专门之学”代替“通儒之学”乃大势所趋，是现代学术的进步。

抗日战争的爆发、救亡运动的高涨，使民族文化复兴运动推向高潮，为儒学精神的新开展或创造性重建提供了历史机缘。儒学在民族文化

[\[关闭窗口\]](#)